

# 季辛吉第八次訪北平

陳明

## 對和解的異見

季辛吉與喬冠華在「人民大會堂」酒會時公開表示有關美俄和解的意見。喬冠華說：

「事實證明和解並未進展到新的階段，反而一個新的世界性戰爭却在醞釀中。」又說：「對付霸權主義唯一的辦法，是用以牙還牙的鬥爭方式來反抗它。如果僅靠自我陶醉的幻想來替代現實，只有更加促使侵略的野心，造成不可收拾的結果。」①

喬冠華這次的外交辭令，變成了對季大教授的講課，是季辛吉過去七次訪匪從未受到的「禮遇」。雖然季辛吉是「兩面外交」的能手，遇到這一般人認為意外的場合，亦多少不免感到不自在。季辛吉在舉杯回敬時不甘示弱地表示：

「一個國家政策應該適合其本國環境與利益。一九七二年尼克森訪問時在上海公報中已經表示美國亦將反抗霸權。但是美國也將盡力避免無謂的對抗，只要在不損及任何第三國家的安全原則之下。美國對這項政策的執行是依據行動與現實的配合，而不是咬文嚼字。」②

這些文詞是季辛吉少用的，而且與喬冠華的批評，正好針鋒相對，因此很可能造成緊張的局面，事實上是「假戲」，但不能意氣用事，「真演」下去。所以季辛吉立即緩和下來，接着向中共的「長征」四十週年紀念祝賀，稱為「人類精神的勝利」。季辛吉更用安撫的方式，強調「美國對美「中」關係的重視超過任何關係，但美國的任務不是去加深任何對和解政策的異見，而是進而求彼此利益上的共同原則。保證和解關係能使大家都有好處，而不會形成任何威脅。」③

## 毛共的安排

毛共在季辛吉第八次訪問前後所作的安排不外是宣傳與實質相配合，「

又假又真，又虛又實」本來就是外交的特性，而毛共與季辛吉更是這種「兩面外交」的專家，當然這一次也不會例外。

首先毛共在選擇了適當的時間公開地對「美國支持西藏反叛份子活動的支持」強烈抨擊。在這件宣傳重於其他因素的做法中提示了一點「實質」——季辛吉這次為福特總統訪問的準備工作不能期望太高④。毛共雖然對美國未能終止對西藏駐紐約的新聞處的支持表示不滿，而且又未曾拒絕一個由西藏流亡難胞組成的歌舞團表演，更覺沒面子，但極容忍地沒對美國指控為違反「上海公報」精神或干預「中國內政」。

另一政治宣傳攻勢當然是毛共對美國最主要的，也是從未間斷的「台灣問題」與「關係正常化」。毛共對美國提出的所謂「三撤」要求是「關係正常化」的主要障礙。毛共一再對美國堅持在雙方建立正式外交關係前必須對中華民國的台灣「撤軍」、「撤館」以及「撤約」（中美共同協防條約）。而季辛吉在過去亦一再堅持這種關係正常化必須由毛共先行解除以武力對抗台灣。這次季辛吉訪問時却得到另一個實質的顯示——即「台灣問題」雖未能獲得進展，毛共仍然歡迎福特總統的訪問。換句話說，這次福特總統的訪問將不可能「解決」「台灣問題」。事實上，毛共對美國事務亦很清楚，一位即將面臨大選的總統候選人在外交事務上是不太可能作任何承諾的。何況毛共本身在目前沒有能力去談判所謂「台灣問題」。周恩來是美毛關係的建築師，也是毛共對美政策的主要決策與執行者，現在却臥病不起，甚至不能與美方的建築師季辛吉會面。鄧小平雖暫代大權，但在季辛吉的眼中只是「過渡時期」的領導，毛周死後的毛共政權繼承問題仍是一個未知數。

毛共原來的如意安排是滿以為越南淪陷後，加上世界經濟與能源危機，中華民國一定土氣不振；特別是在總統 蔣公逝世後更會使台灣衰弱，那麼季辛吉與福特訪問時就比較容易「談判」了。可惜的是事實與毛共的幻想相違，「中華民國從世界能源危機與經濟不景氣中恢復得很快」⑤。政治上更出現了強有力的領導⑥。因此毛共在去年不斷對美國去訪的官方人員表示急於

解決「台灣問題」而一變為「退讓」的態度⑦。當然這並不表示毛共已對「台灣問題」讓步，只是不得不表示「耐性」地等待時機。同樣地也可以預料福特總統去大陸時不可能不談這些政治問題，但這項「台灣問題」將不會是唯一的重要問題，因為其他的實質問題將是雙方都比較更關切、更急於解決的問題。美國急於知道毛共對美俄和解的立場，對核子武器控制的態度，貿易及關稅問題，以及對韓國局勢的立場等。而毛共則更急於要求科技的援助，軍事防衛設備的售給，貿易最惠國待遇，航海入港權，「凍結資產」的解決，高級精密的雷腦系統與醫學科學儀器，以及開採油田的合作等。紐約時報認為這些實質上的安排將可能取代政治宣傳的強調，而導向美毛「關係正常化」。

當然季辛吉仍是受到毛澤東的重視，給予第四次的接見。參加會談的人除了美國駐北平辦事處主任布希（George Bush）外，有季辛吉最得力的助手國務院政策設計委員會主任委員勞德（Wiston Lord），還有一位白宮的女秘書包迪克（Anne Bodicker）。毛共方面除了鄧小平、喬冠華外，黃鎮與外交部副部長王海容亦參與。季辛吉與毛澤東會談是高度機密的，除了參與者外，沒有任何發表的文件可以藉作內容分析的依據。但據格林威（Greenway）與一位不知名的高級隨員在北平飛往東京途中的談話：「中共似乎對美國在外交上的表現軟弱而加以大胆的批評；美毛的關係似乎沒有進展的跡象。」毛澤東當然希望美國與蘇俄能相互衝突，並且表示對蘇俄的恐懼。至于毛澤東與季辛吉真正談話的內容不太可能有什麼重大的「實質」，雖然毛澤東對季辛吉與鄧小平的談話要點大部份都能提示到，一般來說應該是「禮賓」重於「實質」的外交安排。

## 對世局的看法

根據隨同季辛吉這次訪問大陸的美國高級官員在私下表示：「這次雙方會談中最重要的一項議程是雙方對國際局勢的評價。」⑧毛共認為當今美國對國際事務最主要的任務是維持世界均勢。在國際社會中美國應當表現決斷的能力，表現權威的能力與自信的能力。只要對方（指蘇俄）尊重美國，解決國際問題將不會有很大的困難。但是美國如果顯示出其「無能」的行為⑨，或是對世界沒有正確的認識，對國際事務沒有執行的能力，那麼美國將會

遭遇的麻煩就多了。毛共並特別對季辛吉指出所謂「無能」的行為可以美國在情報上保密不夠為例。

季辛吉與鄧小平對國際局勢一般性討論，被形容為「坦誠友好」，對重要問題提出各自的看法。鄧小平認為美毛共關係從去年季辛吉訪問後，幾乎沒有什麼特殊的改變，或重要的進展，世界亦無多大變動。他表示毛共對世局的進展以及對美關係之演進，希望雙方經常磋商、交換意見，即使彼此利害不一而引起爭論亦無妨礙。季辛吉幽默地回稱：「爭吵可以讓新聞記者有材料可寫。」事實上，鄧小平的意思是與喬冠華、季辛吉在酒會上以「美俄和解」所作的針鋒相對。

因此，吾人可以觀察出來，毛共之所以公開地對美俄和解表示不滿，故意給予警告與抨擊，但在私下會談時則並未提及，更沒有影響其他會談的內容。雙方都表示彼此雖有歧見，但不論異見多深，仍然是有增進雙方關係的必要。

在談判形態上，毛共與蘇俄的戰術是顯然不同的。中共在談判時一定會選擇一個「立場」，堅決不願改變，而蘇俄在談判過程中則一再要以一個明顯的形態，來表示他們佔到了上風。這次會談的內容除了季辛吉、勞德、桑尼費德（Sonnefeld）、來天惠（Claysteen）、哈比（Habib）羅德曼（Rodman）外，無人知曉。新聞發佈時只提及內容將包括西歐、中東、韓國問題及印支問題。

在這次會談中，毛共不再批評美俄和解，並且正式對季辛吉表示：「既然已經公開地表示了立場，私下會談時就可以不必再提了。」⑩在整個會談過程中，毛共始終讓美國官員處於一種猜測的氣氛之中，並且強調他們一旦達成決議，必定堅守立場。美方人員很想知道毛共內部政權局勢，但始終未能如願。毛共一再表達他們與蘇俄的不同立場，特別強調蘇俄軍事策略與目標的不同。

## 「台灣問題」

「台灣問題」一直是美毛關係中最重要的的一個關鍵問題，但在這次季辛吉訪問期間却沒有受到重視。雖然雙方都認為除非「台灣問題」獲得解決，美毛關係全盤正常化是不可能的。在這次季、鄧會議有一點值得我們特別注意的

是毛共始終將「台灣問題」保持「新鮮」，對美國表示「只要台灣在政治上與大陸分離，他們就不能放棄台灣」，但是並沒有對季辛吉加以壓力，相反地却建議應該由美國設法去打開這個結。毛共爲什麼會表示這種態度？理由應該是很明顯的。自美國撤軍越南後，毛共深恐在亞洲造成權力不均勢，更不希望美軍撤離亞洲，造成真空，使蘇俄有機會來填空。所以毛共一再對季辛吉表示美國應當在歐、亞地區維持強大軍力以防止蘇俄的威脅。除此之外，毛共當然也對美國大選前的情勢表示關懷，特別是不願意使福特總統有意追隨「尼克森——季辛吉」外交政策的機會受到影響。

至於美國對「台灣問題」在目前有兩種現實的看法。第一種看法是：台灣的中華民國在華盛頓擁有強大的說服影響力量，並且與日俱增。支持中華民國的右派保守份子目前反對有任何對台灣不利的政策，甚至於左派自由份子亦認爲美國應對台灣問題特別慎重處理，不能損及美國利益。福特總統在這種情勢之下是很難有所作爲的。他如果與毛共採取任何有關台灣問題解決的談判，都可能使福特總統遭遇很大的困擾。第二種看法是：美國爲欲與毛共談判「台灣問題」，不如趁毛周仍在世時，因爲他們既然是美毛關係的推動者，比較容易談，如等下去，則繼任的人是否會接受就是未知數了<sup>①</sup>。因此，國務院官員中有人建議：雙方解決的途徑應當是以「政治上可能辦到」的方式，而不是「什麼是最理想」的方式。在目前政治上可辦到的是讓福特總統到北平去走一趟，使美毛關係仍然保持現狀，並以文化交流、貿易配合外交的進展。季辛吉認爲這種做法還可以使蘇俄減少其行爲的侵略性，正如蘇俄相信美俄和解會使毛共在國際關係中地位降低。

這種三角關係是季辛吉在極微妙的國際關係實質型態中所安排的，在結構本身來說，是異常敏感而脆弱的。毛共可以公開地反對美俄和解，美國則對毛共表示美國反對蘇聯的勢力擴張，但會盡全力去避免不必要的對抗。所以，美國這局博弈的公式就成了：「與毛共與蘇聯，要兩面討好，又要分庭抗禮。」這也就是爲什麼福特總統必須訪問大陸的原因。

巴奈特教授在他的著作：「不可預測的行程」書中指出毛共今日面臨的問題，仍是怎樣面對現代國際社會，以及擔任什麼角色的老問題。毛共在涉及主權問題時表現得最敏感，但現實考慮也會採取彈性政策，毛共對香港的做法可以作爲它對「台灣問題」的前例<sup>②</sup>。巴奈特認爲美國在亞洲的基本目

標應該是在不忽視小國利益的原則下，使美國、蘇聯、日本與毛共的主要力量建立一種穩定的關係。美國與毛共的「密切合作」，乃是一個不可缺少的條件。

國際政治學者摩根索教授却指出美國經常在近代外交政策重要的問題上估計錯誤<sup>③</sup>。由於世界權力現勢的維持是一個不實際的評估，造成了季辛吉國務卿錯誤的哲理意識。因此，他在外交上的失敗不是來自美國外交政策觀念上及執行上的某些特殊的弱點，而是由於季辛吉個人外交政策所塑造成的世界整體觀與現實觀念。這種錯誤的矛盾造成美國外交政策的「無能」。

六十四年十一月十七日完稿

註釋：

①②③ H.D.S. Greenway, "Kissinger, Chinese State Differences Over Detent," Herald Tribune (October 20, 1975), p. 1.

④ The New York Times (Oct. 20, 1975), p. 6.

⑤ 這是紐約時報初次對我國作有利的真實報導。見 October 20, 1975, p. 6.

⑥ 同上註。

⑦ 同上註：特別是伊利諾州共和黨參議員普西 (Charles Percy) 於今年八月訪匪後對參議院提出的報告中提出對「台灣問題」毛共態度仍然很急且很強硬。

⑧ 是指鄧小平與季辛吉對一般國際局勢交換意見，參看 Greenway, op. cit.

⑨ 同上註。

⑩ The New York Times, (Oct. 19, 1975) p. 3.

⑪ 主要學者如 A. Doak Barnett, Uncertain Passage: China's Transition to the Post-Mao Era. Washington, D.C.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1974, Chapter VI.

⑫ 同上註。Chapter V.

⑬ Hans J. Morgenthau, "Explaining the Failures of U.S. Foreign Policy: Three Paradoxes" The New Republic (October 11, 1975) pp. 17-18.